

DOI: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9.02.003

中美贸易摩擦 对企业退出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

王泽宇¹, 殷建瓴^{2a}, 张利庠^{2b}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中国人民大学 a. 商学院; b.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基于国际多元化理论, 利用调研收集的东部三个省份 618 家企业对外出口数据生成的面板数据库, 通过生存分析、PSM-DID 等实证模型, 对贸易摩擦所引发的中国企业国际贸易退出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贸易摩擦会对企业国际贸易市场退出行为产生切实的影响, 但企业互联网销售占比、销售国别多样性和产品多样性等因素会削弱这种影响。因此, 对于企业而言, 应采取国际多元化战略以减少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增强自身生存能力;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 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降低企业国际贸易成本, 同时积极引导企业采用国际多元化战略, 减少企业退出国际贸易市场行为的出现。

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 国际贸易; 市场退出; 国际多元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 (2019) 02-0022-08

一、问题提出

2018 年 7 月, 美国政府率先对 34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正式爆发。尽管在同年 12 月, 中美双方达成共识, 宣布暂时“停火”, 但这一贸易摩擦仍对中美贸易关系乃至世界贸易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从微观角度影响了中国企业对美国甚至对其他国际贸易市场出口的战略选择^[1]。因此, 探索、总结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贸易摩擦背景下, 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将支付更高的关税成本, 这无疑将削弱中国企业对美国甚至全球产品出口的竞争能力。在上述条件下, 中国企业是否会选择退出对美贸易, 甚至退出国际贸易市场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外, 任何贸易争端和外贸政策的变化在微观层面对企业的影响都不是均等和同质化的^[2], 企业会根据不同的贸易政策灵活地调整经营战略, 最终最大程度规避不利的贸易政策影响。根据国际多元化理论, 企业的国际多元化战略影响了企业能否在国际贸易中规避风险、削弱制度层面的不利影响、提升绩效^[3]。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贸易摩擦对企业国际贸易退出的影响, 特别是研究不同战略模式条件下, 公司国际贸易市场的生存情况, 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贸易摩擦对微观经济的具体影响, 以及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的公司战略, 从而应对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

然而, 现有研究尚未利用微观企业数据, 研究贸易摩擦对企业国际贸易退出行为的影响, 更缺乏基于

收稿日期: 2018-12-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业链视角下战略产业选择与投资研究”(17AJY012)

作者简介: 王泽宇 (1982—),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殷建瓴 (1996—), 男,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利庠 (1966—), 男,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

国际多元化视角关注不同企业战略选择的研究,诸如互联网销售比例、销售渠道、贸易国别多样性、企业销售产品多样性等将如何削弱贸易摩擦对企业负面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利用贸易摩擦前后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力图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以期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综上所述,本文拟构筑贸易摩擦对企业国际贸易退出影响,以及相应企业战略抉择对上述影响加以调节的理论模型和假设。此外,利用2017年10月—2018年9月江苏、浙江和广东三个重要国际贸易出口省份的618家出口企业相关国际贸易和财务数据,基于生存分析和PSM-DID等实证模型,检验相关假设,试图得出与之对应的经济学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制定和公司战略方面的建议,以期丰富新贸易形势下国际多元化理论的应用场景,以及对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影响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贸易摩擦与企业国际贸易

贸易摩擦是国际政治冲突和对立的“衍生品”,在世界经济史中存在已久。从最早期的安格洛-汉泽(Anglo-Hanse)贸易摩擦模型^[4]和霍利-斯穆特(Hawley-Smoot)贸易模型^[5],到现代化贸易摩擦结构,贸易摩擦的特征正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而变得更为复杂、隐蔽,而所涉及的主体影响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从微观主体来看,贸易摩擦的本质在于以加征关税的方式提升企业出口成本,从而抑制企业的绩效表现^[6]。根据波特(Porter, 1989)的观点,市场的进入壁垒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有显著的影响^[7]。一方面,在关税和市场门槛提高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大幅增加,从而导致企业绩效的负向增长^[8];另一方面,受国家制度层面影响,企业的持续绩效增长难以在贸易保护壁垒的建立过程中得到保障^[9]。这就导致了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经营销售成本大幅提升,最终企业在出口国的绩效表现难以达到预期,甚至会遭受大幅亏损,企业不得不选择退出国际贸易市场。

但在宏观层面,自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国对外出口增长率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与上述经济学论述和经验直觉不符,因此有必要探索贸易摩擦对微观企业的影响,观察具体征税名单行业和具体企业对贸易摩擦政策的反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 贸易摩擦会迫使企业退出国际贸易市场。

(二) 企业国际多元化战略的调节作用

面对经营成本骤增的压力,企业可以选择国际多元化战略以降低风险,提高经营绩效^[10-12]。作为探索国际机遇与市场不平衡性的关键,国际多元化战略可以在开拓市场的同时降低企业经营风险^[13],这对于贸易摩擦情景下的企业国际化经营意义重大。

从销售渠道来看,企业可以实现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多元化。互联网销售渠道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14],使得经营者可以随时随地办公,减少了受办公地点和租金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企业无需在出口国设立营业网点以支持业务流转,这为企业减少了巨大的运营成本。同时,互联网交易平台的信息披露机制和交易代理机制降低了企业在促成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如谈判费、合同费等交易成本,进一步帮助企业提高收益和经营绩效^[15]。因此,互联网销售作为一种多元化销售渠道战略可以为企业经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以抵消国际贸易壁垒提升产生的负面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2: 互联网销售比例较高的企业,贸易摩擦对其退出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较小。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国别多样性较高的企业因市场数量优势,可以拓展产品的销量和企业自身的市场规模^[13]。方等人(Fang et al., 2007)^[16]的研究发现,在实施国际多元化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可以依托不同国际渠道,实现营销技术^[17]、科技知识^[18]、国际化经验^[19-20]等关键性资源的对接转移。此类转移既可以表现为分公司与总公司间的资源流动,也可以呈现为不同地区分公司间的资源转移。在贸易摩擦背景下,某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贸易摩擦会导致关税壁垒的提高,增加企业的国际经营成本,致使企业不得不退出贸易冲突国的国际贸易。在贸易国别多样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将贸易冲突国的经营资源转移至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小的国家市场,从而保持自身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位置。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3: 贸易国别多样性较高的企业, 贸易摩擦对其退出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较小。

希特等 (Hiitt et al., 1997) 提出, 企业多元化战略的目标之一是降低风险^[13]。在国际贸易中, 产品多样性较高的企业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 降低国际贸易市场退出的可能性。由于产品种类较多, 且市场覆盖面较广, 因此在贸易摩擦背景下, 产品受关税提高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 由于关税壁垒清单具有局限性, 只能对特定品类产品加收关税, 对于产品多样性较高的企业, 只有少数或部分产品的销售

成本会有所增加, 企业仍可依靠其他产品获得利润, 维持企业国际化经营^[21]; 另一方面, 产品多样性较高的企业可以灵活地改变产品种类的资源分配支持, 在贸易摩擦情境下加大对未受影响产品的相关投入, 从而弥补关税壁垒提高所带来的成本差距, 保持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位置。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4: 贸易产品多样性较高的企业, 贸易摩擦对其退出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较小。

根据上述假设本文构筑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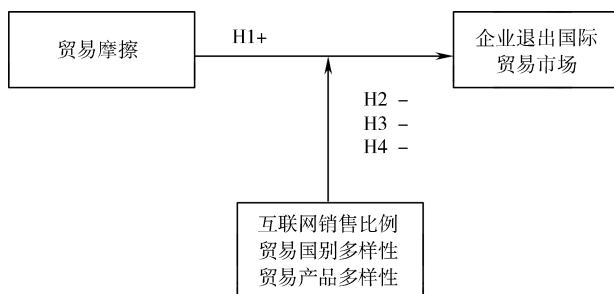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三、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相关假设, 本文选取了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 618 家企业进行调研, 由当地政府主管机关协助抽取企业相关国际贸易、财务和人力资本等数据, 形成从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9 月的面板数据库。

本文选取这一时间段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中, 美国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对第一批价值约 34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关税。在本文数据库涵盖的 12 个月内, 关税生效期为 3 个月, 能够较好地说明贸易摩擦关税提升所引发的退出效果。本文不再选取 2018 年 10 月第二批名单生效后的时间作为样本, 主要是因为第二批生效名单增税额度为 10%, 而自 2018 年 1 月以来, 人民币贬值幅度已经达 10% 左右 (2018 年 1 月 31 日美元对人民币离岸牌价为 6.29 人民币兑 1 美元, 到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为 6.95 人民币兑 1 美元), 增税影响可能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完全覆盖, 并且两次增税的叠加效果可能产生相关的共线性问题, 不利于模型的稳健性和相关分析。

为了对照研究贸易摩擦的相关影响, 本文所选取的 618 家企业中有 196 家主要经营范围被涵盖在第一批 340 亿美元清单目录中, 剩余企业主营业务未涵盖在上述目录之中。

为了更好地观测贸易摩擦对国际贸易退出的影响, 本文所选取的 618 家企业在 2018 年 3 月以前都参与国际贸易业务, 并且国际贸易业务占总业务比重在 30%~70%。由于贸易摩擦增税影响主要局限于对美贸易, 本文所选取的企业对美贸易占国际贸易比例都在 30% 以上, 具体见表 1。

四、变量设计

(一) 被解释变量

根据邓等人 (Deng et al., 2014) 的研究, 企业的外贸退出代表了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的业绩水平, 在遭遇相应的外部冲击之后, 企业外贸收入和利润下降, 必然导致其退出外贸市场^[22]。因此, 本文利用企业外贸退出虚拟变量度量企业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业绩情况。由于生存分析使用企业生存作为因变量, 继续根据邓等人 (2014)^[22] 的研究, 本文分别利用企业外贸生存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在观测期下一个月依旧具有外贸市场份额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同时, 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生成企业美国生存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在观测期下一个月依旧具有美国市场份额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作为因变量;此外,本文还通过调研收集了企业当月利润率作为因变量,利用 PSM-DID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 解释变量

在已有研究中,政策分析普遍利用根据时间划分的政策实施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相关政策的影响^[23-24]。本文以 2018 年 7 月为时间节点(2018 年 7 月 6 日美国正式对中国产品加收第一批关税)生成影响虚拟变量,且在 2018 年 7 月之后,企业主营产品在第一批关税征收名单上的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此外,为了进行 PSM-DID 模型分析,本文生成两个虚拟变量:政策虚拟变量(企业主营产品在第一批关税征收名单的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和时间虚拟变量(2018 年 7 月及其以后的观测值为 1,否则为 0)。

(三) 调节变量

在互联网销售条件下,互联网销售手段使用的多寡程度往往能够影响企业面对外部冲击的经营灵活性,因此本文利用企业互联网国际贸易销售额与外贸总额的比例生成互联网销售比,以衡量互联网销售对贸易摩擦影响的调节作用^[25]。另外,本文利用企业国际贸易中购买者国籍数量作为调节变量,观测外贸企业贸易国别多样性对相关政策冲击的调节作用^[26]。最后,产品多样性作为国际贸易中多元化战略的重要部分也会影响企业应对相关的贸易冲击,因此本文利用企业销售产品数量衡量产品多样性^[27]。

(四) 控制变量

本文还加入了其他变量以控制相关影响,例如,企业成立年限(从成立时间到观测期的年限)^[28],公司注册资本(在工商登记中的企业注册资金额),公司规模(公司员工数量)^[29]。此外,本文还加入了企业外贸占比(外贸收入占企业总收入比例)和企业美国销售外贸占比(企业在美国销售收入占整体外贸收入比值)、公司主营业务虚拟变量(按照公司主营业务所在行业赋值的虚拟变量,具体行业分布见表 1)、公司所在地虚拟变量(按照公司所在地区赋值的虚拟变量,具体行业分布见表 1)、季节虚拟变量(按照观测值所处季度赋值的虚拟变量)。变量描述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和相关系数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企业外贸生存	1													
2. 企业美国生存	0.400	1												
3. 企业利润率	0.169	0.129	1											
4. 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0.079	-0.001	-0.309	1										
5. 政策虚拟变量	-0.194	-0.124	-0.116	0.618	1									
6. 时间虚拟变量	-0.232	-0.142	-0.001	0.429	0.398	1								
7. 互联网销售比例	0.205	0.104	0.024	0.019	0.009	0.018	1							
8. 贸易国别多样性	0.348	0.240	0.146	0.002	0.003	0.009	0.300	1						
9. 产品多样性	0.220	0.252	0.087	0.001	0.002	0.005	0.228	0.349	1					
10. 公司成立年限	0.074	0.028	0.030	0.001	0.006	0.021	0.218	0.177	0.295	1				
11. 公司注册资本	0.097	0.149	0.004	0.008	-0.022	0.031	0.013	0.027	0.033	0.195	1			
12. 公司规模	0.115	0.060	0.024	0.033	-0.001	0.001	0.023	0.036	0.115	0.020	0.274	1		
13. 企业外贸占比	0.048	0.066	0.007	0.175	0.063	0.031	-0.199	0.412	0.005	0.324	0.221	0.029	1	
14. 企业美国销售外贸占比	0.020	0.004	0.028	0.025	-0.027	0.009	0.014	-0.023	-4×10 ⁻⁴	-0.007	0.017	0.059	0.117	1
平均数	-	-	0.007	-	-	-	0.177	3.775	11.289	8.401	107.778	117.778	0.441	0.449
标准差	-	-	0.019	-	-	-	0.375	6.527	28.786	7.704	307.770	140.452	0.189	0.116

注:虚拟变量由于输出均值和标准误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本文不再输出其相关统计学特性。

五、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变量设定, 本文首先利用生存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并利用企业外贸退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贸易摩擦对企业整体退出外贸市场的影响, 以及相关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由于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 因此进行交叉项分析调节作用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回归偏误, 因此本文根据邓和王 (Deng & Wang, 2016)^[30]使用调节变量中位数分组回归的模式检验调节作用。由于本文使用市场生存作为因变量, 因此回归系数为负时, 代表相关变量对企业退出外贸市场具有推动作用。

由表 2 可知, 总样本回归模型中贸易摩擦对征税清单目录产品企业的外贸市场生存的回归系数为负, 因此贸易摩擦会促进企业完全退出国际贸易市场, 假设 1 得以验证。另外, 在分样本回归分析中, 互联网销售比例的不同分组中, 更多使用互联网进行销售的企业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更低, 回归系数更高 (绝对值更低), 并且通过相关 Z 值检验, 假设 2 得以验证。贸易国别多样性的分组回归中, 高贸易国别多样性分组中政策影响的回归系数更高 (绝对值更低), 因此贸易摩擦的退出影响更低, 并且通过 Z 值检验, 说明更高的贸易国别多样性能够帮助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影响, 假设 3 得以证明。最后, 企业产品多样性分组结果显示, 在低多样性条件下, 贸易摩擦具有负向的生存影响, 而在高多样性分组中上述影响不再显著, 因此假设 4 得以验证。上述相关检验都通过了边际效应系数和标准误检验。

表 2 企业退出国际贸易市场生存分析的回归结果

	总样本	低互联网 销售比例	高互联网 销售比例	低贸易 国别多样性	高贸易 国别多样性	低产品 多样性	高产品 多样性
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0.017*** (0.008)	-0.028*** (0.014)	-0.006*** (0.001)	-0.029*** (0.009)	-0.007* (0.003)	-0.013*** (0.003)	-0.011 (0.048)
Z 值		3.997***		4.208***		0.306	
互联网销售比例	0.075*** (0.007)	0.035*** (0.002)	0.070*** (0.005)	0.074*** (0.007)	0.048*** (0.016)	0.065*** (0.011)	0.033 (0.079)
贸易国别多样性	0.067*** (0.019)	0.066*** (0.018)	0.022 (0.029)	0.044*** (0.010)	0.075*** (0.022)	0.038*** (0.015)	0.077*** (0.010)
产品多样性	0.007*** (0.001)	0.007*** (0.001)	0.006*** (0.002)	0.002 (0.020)	0.006 (0.005)	0.008*** (0.002)	0.007*** (0.001)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og likelihood	891.691	592.406	590.766	597.847	591.691	592.406	590.766
LR chi ²	473.03	519.60	522.88	508.72	473.03	519.60	522.88
公司数	618	338	320	345	329	339	317
样本数	7 416	3 710	3 706	3 719	3 697	3 811	3 605

注: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外贸退出;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

本文进一步针对企业是否继续对美国市场进行贸易进行回归分析 (因变量为企业美国退出), 因为因变量已经被规定为单一国家市场生存情况, 因此贸易国别多样性不再被纳入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 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退出美国市场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 互联网销售和产品多元化策略也同样能够降低上述冲击的影响, 假设 1、假设 2 和假设 4 再次得以验证。

表3 企业退出美国贸易市场生存分析回归结果

	总样本	低互联网销售比例	高互联网销售比例	低产品多样性	高产品多样性
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0.033*** (0.010)	-0.048** (0.024)	-0.010*** (0.002)	-0.059*** (0.012)	-0.010 (0.037)
Z值			3.997***		5.446
互联网销售比例	0.025*** (0.007)	0.035*** (0.002)	0.020*** (0.004)	0.060*** (0.012)	0.035 (0.037)
产品多样性	0.107*** (0.001)	0.007*** (0.001)	0.007*** (0.002)	0.004 (0.006)	0.007*** (0.002)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og likelihood	773.191	675.433	712.702	530.558	533.477
LR chi ²	315.06	326.78	33.030	273.71	298.98
公司数	618	338	320	339	317
样本数	7416	3710	3706	3811	3605

注：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美国退出；*、**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此外，本文还以企业利润率为因变量，利用PSM-DID方法分析贸易摩擦冲击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在进行PSM-DID回归前，首先要对数据进行非平衡性检验(imbalance test)，以确定PSM-DID模型各个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并且在PSM回归中去除 t 检验不显著的回归结果，经过检验本文选取互联网销售比例、贸易国别多样性、产品多样性、公司规模、公司外贸占比作为匹配变量，其他控制变量由于未通过非平衡性检验予以剔除。由于篇幅限制，本部分数据结果予以省略，备索。

随后本文选取通过 t 检验的变量进行匹配得到PSM结果，进一步进行PSM-DID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回归结果显示贸易摩擦降低了企业利润，这就解释了企业在关税提升和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条件下被迫转向国内市场甚至放弃原有产品品类的经营的原因。但是回归结果也显示了多元化经营手段，诸如互联网营销、国际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能够帮助企业降低上述利润损失。因此，假设1至假设4被PSM-DID结果验证。

表4 PSM-DID回归结果

	总样本	低互联网销售比例	高互联网销售比例	低贸易国别多样性	高贸易国别多样性	低产品多样性	高产品多样性
未进行倾向评分的组间差异	-0.002*** (2.34×10^{-4})	-0.004 (0.006)	-0.001* (0.001)	-0.006* (0.003)	-0.002** (0.001)	-0.007* (0.003)	0.013 (0.029)
倾向评分后的组间差异(ATT)	0.001*** (1.33×10^{-4})	-0.004*** (0.001)	-0.001*** (1.37×10^{-4})	-0.006*** (0.002)	-0.002*** (0.001)	-0.012*** (0.002)	0.009 (0.009)

注：解释变量为企业利润；*、**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东部三省企业对外出口贸易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了中国和美国间的贸易摩擦对企业国际贸易退出的机制影响，并研究了相关调节效应，得出下列结论：第一，贸易摩擦的发动会提升企业出口成本，虽然在短期内中国宏观出口未见明显降低，但是上述宏观数据的强劲表现无法掩盖对征税目录所涵盖的特定行业中企业的影响，贸易摩擦会迫使企业退出国际贸易市场；第二，在贸易摩擦情境下，互联网销售渠道可降低企业销售成本，抵消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企业退出国际贸易

市场的可能性;第三,销售国别多样性较高的企业可进行市场切换、抵御风险,受贸易摩擦的影响较小,并会保持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位置;第四,拥有较高产品多样性的企业可通过其他未受贸易摩擦影响或受影响较小的产品弥补利润的下滑,从而使企业免于退出国际贸易市场。

(二) 理论贡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索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国际贸易退出的影响机制,弥补了国际多元化战略在贸易摩擦情景下的理论不足,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升级、愈发激烈的经济态势下,本文使用中国企业出口数据,对贸易摩擦情境下企业的国际贸易退出行为进行了研究,从理论层面对在贸易摩擦影响下中国经济宏观与微观差异性进行了解释,弥补了贸易摩擦理论中以微观企业为研究主体的理论不足,使贸易摩擦对经济影响的讨论更进一步;其二,本文结合贸易摩擦理论和国际多元化理论,研究了不同多元化特征对贸易摩擦情境下企业退出国际贸易市场行为的调节性影响,探索了国际多元化战略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理论边界,丰富了新贸易形势下国际多元化理论的应用场景。

(三) 实践启示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全面升级,贸易形势复杂紧张,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首当其冲。因此,探究贸易摩擦对企业国际贸易退出的影响机制和调节作用,对于提升国际贸易发展和企业生存率意义重大。一方面,对国际贸易企业而言,应制定完善的国际多元化战略,从销售渠道、销售国家、产品种类三方面入手提升国际经营多样性,以规避或降低贸易摩擦对经营活动的负向影响,提升企业生存率,减少国际贸易市场退出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国家政策制定者而言,探究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企业国际贸易退出行为可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国家可以通过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减少企业对外贸易成本,以抵消因关税壁垒提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此降低企业的国际贸易退出率。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建议企业采取国际多元化战略以降低贸易摩擦所引发的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退出或破产情况的发生,保护本国企业免受贸易摩擦所害。

参考文献:

- [1] LI C, HE C, LIN C.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possible China-US trade war[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8, 54(7): 1557-1577.
- [2] EATON J, GROSSMAN G M.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6, 101(2): 383-406.
- [3] HOSKISSON R E, HITT M A. Antecedent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of diversification: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0, 16(2): 461-509.
- [4] AXELROD R, KEOHANE R O.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J]. *World Politics*, 1985, 38(1): 226-254.
- [5] CONYBEARE J. Trade wa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glo-Hanse, Franco-Italian, and Hawley-Smoot conflicts[J]. *World Politics*, 1985, 38(1): 147-172.
- [6] MCAFEE P R, MIALON H M, WILLIAMS M A. What is a barrier to entr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2): 461-465.
- [7] PORTER M E. How competitive forces shape strategy[M]// ASCH D, BOWMAN C. *Reading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Palgrave: London, 1989: 133-143.
- [8]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8.
- [9] 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275-296.
- [10] PRAHALAD C K, DOZ Y L. *The multinational mission: balancing local demands and global vision*[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 [11] GHOSHAL S. Global strategy: an organizing framework[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7, 8(5): 425-440.
- [12] LEONTIADES M. The rewards of diversifying into unrelated businesses[J].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1986, 6(4): 81-87.
- [13] HITT M A, HOSKISSON R E, KIM H.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product-diversified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40(4): 767-798.
- [14] HONG W, ZHU K. Migrating to internet-based e-commerce: factors affecting e-commerce adoption and migration at the firm level[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6, 43(2): 204-221.

- [15] GRANDON E E, PEARSON J M. Electronic commerce ado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small and medium US businesses[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4, 42(1): 197-216.
- [16] FANG Y, WADE M, DELIOS A, et al.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and the mobility of knowledge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0): 1053-1064.
- [17] SONG M, DROGE C, HANVANICH S, et al.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 analysis of their interaction effect in two environmental contex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3): 259-276.
- [18] CHATTERJEE S, WERNERFELT B. The link between resources and type of diversific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12(1): 33-48.
- [19] LU J W, BEAMISH P W.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M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7): 565-586.
- [20] MAKINO S, DELIOS A. Loc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for alliance formation in Asi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6, 27(5): 905-927.
- [21] CAPAR N, KOTABE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service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4(4): 345-355.
- [22] DENG Z, GUO H, ZHANG W, et al.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of exporters: 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 23(2): 396-406.
- [23] 甘犁, 刘国恩, 马双. 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0(S1): 30-38.
- [24] 周黎安, 陈焯.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J]. *经济研究*, 2005(8): 44-53.
- [25] PORTERFIELD T E, BAILEY J P, EVERS P T. B2B e-commer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firm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2010, 40(6): 435-455.
- [26] BALA V, VAN LONG 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preference selec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21(1): 143-162.
- [27] ROBINSON W T, FORNELL C, SULLIVAN M. Are market pioneers intrinsically stronger than later entrant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13(8): 609-624.
- [28] 王泽宇, 耿天成, 赵艳华. 风险投资人声誉与新三板企业生产力实证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5): 116-126.
- [29] 王海林, 李斌. 企业盈利能力、国际化与网络财务报告系统质量[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8(6): 82-88.
- [30] DENG Z, WANG Z. Early-mover advantages at cross-border business-to-business e-commerce portal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12): 6002-6011.

Impact of China-US Trade Friction on Firm's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WANG Zeyu¹, YIN Jianling², ZHANG Lixiang²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urvey to collect the panel data generated by the export data of 618 enterprises in the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theory, through survival analysis and the PSM-DID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n Chinese firms' international withdrawal triggered by the trade friction. It is found that trade friction will have a real impact on firms' international withdrawal behavior, but internet sales ratio, sales country diversity and product diversity will weaken this impact.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firms should adopt the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 and enhance their survival rate; while policy makers should issue relevant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reduce the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f firms, and meanwhile, actively guide firms to adopt the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mergence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withdrawal behavior.

Keywords: China-US trade fric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withdrawal;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theory

(责任编辑: 蒋 琰)